

媒介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在唐山的早期传播

李秀荣^a, 甘丽娅^b, 白丽娟^a, 冯兆娜^a, 于博艺^a

(唐山学院 a. 学报编辑部; b. 办公室,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唐山的早期传播, 媒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场域满足媒介动员条件下, 经过媒介动员实践, 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媒介气候基本形成: 唐山各类机构和组织蓬勃兴起, 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更广泛的传播; 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 唐山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关键词: 媒介; 马克思主义; 传播; 唐山

中图分类号: K29; G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3)05-0028-07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3.05.004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Tangshan from the Media Perspective

LI Xiu-rong^a, GAN Li-ya^b, BAI Li-juan^a, FENG Zhao-na^a, YU Bo-yi^a

(a. Department of Journal Editorial; b. School Office,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Tangshan, the media played a crucial role.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communication content, communication subject, and communication field m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media mobilization, significant results had been obtain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edia mobilization, and the media climate had basically taken shape: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Tangshan had sprung up, promoting Marxism to a wider spread; With Marxism as the ideological weapon of the revolution, Tangshan workers' movement surged up.

Key Words: media; Marxism; dissemination; Tangshan

一、引言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境内早期传播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和“早期传播”为主题在中国知网平台上进行高级检索(截至2023年7月1日)可查得学术论文1 059篇,比如,期刊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当代启示》《武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以经典文本为例》等,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

播的历史考察及其效果研究》等;以相同检索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进行检索可查得图书著作37部,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研究》等。整体观之,已有文献围绕地点、人物、事件、背景、手段、路径、影响因素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研究,为今后研学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但是相对而言,从媒介的视角来考察此主题的文献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唐山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TSSKL2023-223)

作者简介: 李秀荣(1971—),女,河北乐亭人,副编审,硕士,研究方向为出版和传播;

甘丽娅(1980—),女,河北唐山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历史学与新闻学。

并不丰富,相关研究还有待加强。

“传播学之父”韦尔伯·施拉姆认为:“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而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1]不仅如此,媒介还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改变个人和群体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发动更多潜在行动者和社会资源参与到行动中,从而使运动进一步发展完成规模化转变。这一过程被定义为媒介动员^[2],媒介动员很明显地透露出媒介“解放的力量”。基于此,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媒介动员,是指多元媒介形态交叉配合、共同作用,促进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认同和信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将其大众化、中国化,使其从点点星火变为燎原之火,最终成为“拯救中国的导星”,进而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唐山是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对于区域性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文以媒介动员为逻辑主线,应用媒介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唐山早期传播中媒介动员的条件、实践和结果,以清晰呈现媒介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在唐山早期传播的历史镜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而回望马克思主义在唐山的早期传播史,也是对真理与真相的追求与揭示,这对于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在唐山早期传播的媒介动员条件

媒介是传播必不可少的元素,它既是信息的搬运者,也是传播过程中连接各种要素的纽带,其基本要素包含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而传播的“里程碑”便是传播效果。传播效果除受媒介本身影响外,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以及包含传播环境和传播受众的传播场域也都对其产生约束作用。这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

而言,要想在中国或者中国的某一区域有效传播,形成媒介动员的磅礴之势,成就其传播和实践的壮丽前景,那么令人信服的传播内容、积极的传播主体、适宜的传播场域则是必备条件。

(一)传播内容的真实性

心理学家 Hovland 等认为传播内容的可信度是说服受众的先决条件,如果信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那么受众会更同意它且很可能被它说服^[3]。依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为其行稳致远进而有为的传播结果提供了先天条件。20 世纪初期,各种主义和思潮充斥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都尝试着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但纷纷“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此时马克思主义却脱颖而出,而后落地生根,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引领,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其答案是被后来无数实践反复证明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它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运动一般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世界唯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4]。早在 1644 年,弥尔顿在其《论出版自由》中说:“通过真理与谬误的搏斗,真实、正确的思想和观点必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虚假、错误的思想和观点必然为人们所抛弃。”^[5]此言恰好完美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能在纷繁复杂的思潮中博弈胜出的原因。“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4]它的真理性、思想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从分化走向聚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信仰者,从而躬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践。

(二)传播主体的坚定性

当社会运动的舆论要素已具备,能否将舆论效果推向最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主体的执念。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的执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为传播主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必然是加快马克思主义

传播速度的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路坦途,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前,李大钊等通过发表文章和演讲,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且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但是仍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诋毁和攻击,由此在五四运动之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激烈的论战。论战不仅成功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和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作出了合理的判断,有力批驳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而且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由此引导更多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正是因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才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它的传播。

唐山早期先进分子如邓培(原唐山机车制造厂工人、唐山工人运动领袖、河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阮章、梁鹏万等,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学习进而对其宣传、皈依,从最初的信息接收者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践行者,此过程同样也离不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媒介建构理论认为,参与了意义生产和交流的传播活动,参与者则不再是简单的受众,而是积极行动的、解释的、建构意义的行动者。而如果将此处的“意义”升华为“信仰”,便会毫不费力地解释唐山早期先进分子为什么成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者。建构信仰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对真理的坚信;二是对价值的认同;三是对感情的融入^[6]。显然,从这些唐山早期先进分子的革命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满足了这三个条件,表明他们已经将马克思主义构建成了自己追求的坚定信仰。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开展媒介动员活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点醒迷茫中的中国人,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普及和思想提升,使之获得更明朗的价值追求。“勇往奋进以赴之”“瘁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是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追随、实践、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写照,他们正是因为拥有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才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三)传播场域的需求性

1. 苦难深重的唐山实境

传播场域是决定传播信息需求强弱和影响传播效果好坏的物质因素。近代唐山是我国较大的工矿城市,拥有几万产业工人,而且较早就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驻,比如,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管理权在 1898 年被英帝国主义控制,开滦煤矿当时是中英合资企业^{[7]46}。1919 年李大钊曾撰文揭露了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的悲惨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8]可见,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苦难深重是唐山工人境遇的真实写照,但由此他们也积累了很强的阶级仇恨及反抗意识,迫切希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希望能有一盏科学明灯照亮求解放的正确道路。

2. 工人阶级的革命需要

传播理论认为,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只有符合信息接收者的内心需要,才能够与之形成情感认同、产生价值共鸣而被接受。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唐山的部分工人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救国救民以及改变社会现状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觉醒,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们又集聚了空前强烈的爱国热情。唐山的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持续近一年,在此期间,以邓培为代表的唐山工人成立了“同人联合会”以及“救国十人团”,反映了工人阶级在爱国斗争中要求联合和组织起来的迫切愿望;同时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反帝救国的政治罢工,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提供了条件。然而唐山工人阶级虽有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但对于“推翻整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还不懂得怎样“用共产主义来抗议”^[9]。1920 年春,闪耀着真理之光的马克思主义恰好走来,它提供了分析无产阶级苦难问题的方法、指明了解决问题的路径,这正是唐山工人之急

需,刚好契合了他们求自身解放和求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形成了积极的媒介接触欲望。因此,马克思主义迅速被唐山工人所接纳,而且与唐山工人运动迅速结合,成为科学的思想武器,由此推动了唐山工人运动高潮的发展。而有了工人阶级这样坚实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便越发稳固地在唐山传播开来。

三、马克思主义在唐山早期传播的媒介动员实践

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10]76}。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作为一种理论要流布于社会、彰显其价值、发挥其影响,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方能实现。媒介按不同的属性有多种分类,从宽泛意义上讲,媒介不仅包含书刊、传单、小册子等这些文字媒介,而且还包含讲习、演讲、讨论、交谈、口号等口头媒介,以及节日、仪式、机构、组织等其他媒介,即万物皆媒介。在创造列宁口中“无产阶级百万大军”的过程中,这些媒介在促进动员信息有效到达动员对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1]。而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怎样展示其不可替代性是以媒介动员实践为表征的。下面仅重点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唐山早期传播中文字媒介和口头媒介的媒介动员实践。

1. 以文字媒介为“播种机”

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文字媒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载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文字媒介,才系统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唐山工人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媒介接触是从1920年4—5月阅读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先进组织寄送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劳动周刊》《工人周刊》《劳动音》《共产党宣言》等进步刊物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的。这些书刊先寄到邓培等唐山先进分子手中,然后由他们分发给工人秘密传阅。这些五四时期进步刊物的传播学意蕴在于:一是实现了信息

的承载,即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信息内容里;二是进行了信息的加工,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分析,并以受众易于接受的或通俗的语言或生动的事例呈现出来^[12]。随着这些进步刊物的广泛传阅,唐山工人不仅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且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们寄托于文字当中的先进思想的启发,以及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率先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的激励,由此在心中播种了革命的火种。文字媒介所发挥的“播种机”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唐山乃至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2. 以口头媒介为“扩音器”

口头媒介是面对面人际传播的主要信息载体。口头媒介不仅具有内容即时性、行为交互性、语言感染性、目的价值性等特点,而且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易于达成相互理解和沟通,且受众个体的意向易受到周围人的带动影响。比如,李大钊曾在北京多所学校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和“史学思想史”等课程,这直接提升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他发表过多次演讲,而“听他的演说,觉得有极大的煽动力”^[13]。再比如,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邓培参加了纪念活动,他带领工人、学生走上街头高呼“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使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进一步提高了唐山工人的思想觉悟^{[7]35}。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口头媒介发挥了“扩音器”的作用。

唐山工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口头媒介应该是由1920年初春旅俄(法)华工发起的。他们经历了欧洲各国的工人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归国后他们将自己了解的各国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之法以及习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讲给唐山的工人听,工人们由此燃起了希望之光,盼望着“工人之国”的早日到来。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等先进组织经常派代表到唐山,有针对性地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从而也构建了口头媒介。比如,1920年4

月罗章龙(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者之一)在李大钊的安排下与邓培接触;1920年夏秋之际,天津的共产主义者张太雷、驻天津的共产国际联络员鲍立维与邓培会面。李大钊本人以及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如张国焘、邓中夏、王尽美、何孟雄、高君宇、朱务善等都曾到唐山开展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7]25}。

总之,上述通过人际交往而构建的承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口头媒介,一是对应了传播学中对修辞功能的描述,言辞具有相当大的力量、信息有益于人们作出正确判断^{[10]105};二是强化了唐山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使他们认识到这种理论对于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的重要作用;三是适应了当时大多数工人文化程度不高(识字水平不高)的传播环境;四是塑造了群体内核,更加直接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空间。因此,口头媒介在与文字媒介交相呼应中有力地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促使唐山工人自觉掌握这种理论,将其变成了战斗武器。

四、马克思主义在唐山早期传播的媒介动员结果

媒介动员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媒介气候。著名的传播学学者伦纳认为:“传播媒介可以创造经济和社会所需的‘气候’(climate),一旦充分使用媒介,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加速进行。”^[14]由此,媒介气候之词产生。其中“climate”也可译为“风气、思潮、风土”等,大意指经媒介宣传后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媒介气候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教化力量,受众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从而促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进行”。经过媒介动员,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气候在唐山逐渐积累起来,形成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社会共识,且将之付诸实践的使命感和凝聚力不断增强,并在工人中相互感染、蔚然成风。此时,唐山马克思主义媒介气候的显著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由自发传播转变为组织传播以及其与劳苦工农翻身

解放革命斗争相结合。

(一)机构和组织的蓬勃兴起

为了在政治上产生合力,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及李大钊等人的支持下,唐山的先进分子充分动员广大资源创建了图书馆、工人学校以及地方党组织这些思想载体和革命行动指挥所。1920年底,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的帮助下,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1921年称京奉铁路唐山工会)成立,这是一体现阶级自觉的近代产业工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标志着唐山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发生了质的飞跃^{[7]33}。1921年7月,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李树彝的帮助下,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所有团员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青年团成为唐山地方党组织建立前领导唐山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7]36}。此后,唐山工人图书馆、林西矿工余补习班、唐山矿大同社、铁路工人补习夜校、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后改组为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唐山地委)等纷纷成立,它们对于促进工人学习文化知识、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工人无产阶级觉悟、发现和培养革命骨干、发展党团组织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由此,唐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而且1922年8月成立的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是中共河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唐山人民的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唐山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踏上了有组织、有纲领的自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征程。

图书馆、工人学校、工会以及地方党组织等机构和组织的建立,为唐山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基础,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途径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有效的媒介形式。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这里所提到的每个机构或组织都是独立的信息系统,它们有计划地收集、处理和使用信息,同时生产、创新信息,从而保持了系统的价值导向和整个系统的凝聚力,使媒介手段从分

散走向聚拢,使受众从个体汇聚成群体,使传播范围从先进分子向更广大的工农群众转移,实现了以这些机构和组织为中心的裂变传播,在唐山达到了扩散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

(二)唐山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随着图书馆、工人学校、工会以及党组织的相互增益,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唐山工人心中的一束光、一种坚定的信念,从而激发出了无限的战斗热情,形成了一股有政治觉悟的战斗力量,由此马克思主义从纸上的新观念转变成为街头的洪涛巨浪^[15]。

1922年10月13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3000名工人举行了8天的大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推动了唐山工人运动高潮的发展,并带动了10月23日由3.7万人参加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和10月28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800人的罢工。这些罢工反映了唐山工人的彻底觉醒和工人运动水平的提高,标志着唐山工人运动从自发进入自觉斗争的新阶段。在1922年的工人运动高潮之后,中共唐山地委又不失时机地领导唐山工人进行了多次斗争,如1924年华新纺织厂工人罢工和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2000名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1925年华新纺织工人罢工和开滦赵各庄煤矿工人罢工等^[16]。唐山工人运动高潮的发展,首先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了从文本政治到具身革命的生存化转变;其次表明通过组织的作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的工人和各界群众能够形成大联合,汇成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从媒介实践变迁的角度来看,未与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接触前,饱受苦难的唐山工人虽然已经具备了反抗意识,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依托和价值动因可能会继续从传统中得到支援,但由于缺乏政治纲领,定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片面性和松散性;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接触后,文字媒介所营造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图景重新构建了他们参与革命斗争的动力机制,促使其积累了更强烈的战斗精神

和阶级意识,同时“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诸如此类的运动口号又使其有了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会将自身参与的翻身解放的革命活动放在“国家”“世界”这些更大的视野中进行价值定位。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断深入,唐山工人逐渐从传播信息的被动接纳者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的言说者、信奉者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的革命者;同时,改变了斗争的内容,从不自觉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由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斗争转变为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说明,媒介的实践变迁代表着社会运动的认知变化和指导方向的修正,媒介有着建构现实的巨大力量。

媒介气候形成的另一标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继续坚定地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吸引着更多人从思想上、情感上对马克思主义实现皈依,党与人民之间构建的“共通的意义空间”不断扩展,于是山鸣谷应、一呼百应,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循着马克思主义指明的道路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后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和改革的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4]。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媒介之于马克思主义在唐山的早期传播扮演的中介角色来看,它连接了多重力量和社会资源,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知识分子、工人领袖、普通工人以及其他民众汇聚起来,又将图书馆、学校、工会、党组织等机构和组织串联起来,构建了一个各要素相互联系又重叠嵌套的关系网,然后发挥其传输思想、联络成员、连接组织、汇聚群体、建立关系的重要作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火种的播撒,最终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重要地位,从而中国得以解放、人民得以幸福。此过程媒介功不可没。

媒介固然重要,然而毕竟由人控制。马克

思主义在唐山的早期传播能够收获如此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是因为传播主体很好地形塑了各种媒介工具并加以综合运用,开展了共产主义色彩的媒介动员活动。因此,今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需要发挥人的能动性,注重媒介的运用技巧,以便充分发挥媒介作用,提高实效。

参考文献:

- [1] 韦尔伯·施拉姆.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 金燕宁, 蒋千红, 朱剑红,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0: 134.
 - [2] 叶明睿, 陈桂川. 分担、共享与互促: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农村电商发展中的媒介动员[J]. 现代出版, 2021(5): 56 - 61.
 - [3] HOVLAND C I, LUMSDAINE A A, SHEFFIELD F D. Experiments on mass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Vol. 3[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56.
 - [4]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8-05-0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04/c_1122783997.htm.
 - [5] 弥尔顿. 论出版自由[M]. 吴之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44.
 - [6] 王玉樑. 论理想、信念、信仰在价值观中的地位及其意义[N]. 光明日报, 2000-09-19(3).
 - [7] 王士立. 邓培传[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 [8] 李大钊.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工人不如骡马[M]//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436.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 1 卷[M]. 李季,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5.
 - [10] 段鹏. 传播学基础: 历史、框架与外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 [11] 谢欣. 意动叙述视角下党报的媒介动员研究: 以《人民日报》的奋斗型“幸福”话语为考察对象[J]. 东南传播, 2023(1): 56 - 58.
 - [12] 黄鸿业. 大众媒介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J]. 新闻世界, 2011(4): 188 - 189.
 - [13]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史事综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270.
 - [14] 王斌. 浅谈新闻传播的重要性及其对大众的影响[J]. 今传媒, 2019, 27(3): 50 - 53.
 - [15] 彭志翔. 从纸上到街头: 工人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基于“五四”后《晨报》和《民国日报》的媒介学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 30(5): 113 - 125.
 - [16] 王士立. 中共唐山地方组织创建的时间和早期的历史作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1, 23(4): 3 - 7.
- (责任编辑: 李亚平)
-
- (上接第 20 页)
- [41] 刘大椿. 论科学精神[J]. 求是, 2019(9): 61 - 67.
 - [42] 陈金龙.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372.
 - [43] 习近平.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5-01(1).
 - [4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45] 贺敬之. 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开幕词[N]. 人民日报, 1991-09-25(4).
 - [46] 董学文. 鲁迅精神的主脉与主线: 写在先生诞辰 130 周年之际[J]. 高校理论战线, 2011(9): 69 - 71.
 - [47] 任姗姗. 通往中国的最短路径[N]. 人民日报, 2016-08-30(24).
 - [48] 郭若平. 时间限度: 中共概念史研究的技艺认知[J]. 中共党史研究, 2017(11): 39 - 53.
- (责任编辑: 李秀荣)